

## 訪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執行長蔡政文教授

訪問人：藍健民

摘記：鄭光伶

**首先可否請您介紹一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性質與業務內容？另外，可否告訴我們，基金會的研究成果如何影響，或成為政府的政策？**

基金會原為民國82年連戰先生擔任行政院長時，以個人名義成立作為其私人智囊機構，當時組織尚小，分為政治與經濟兩組。我所負責的政治組，每個月原則上提交二至三篇政治相關研究議題，經濟組則提供一至兩篇予院長，院長如認為不錯的建議案再將報告轉交給相關單位參考。

2000年政黨輪替，基金會擴大為國民黨的智庫，但仍為獨立的財團法人。國民黨除了提供基金會辦公地點，人員亦增加許多。由於當時國民黨成為在野黨，所以基金會的工作除了提供黨中央政策建議，同時亦提供黨籍立委在修法與立法上的建議。此外，基金會更分為八組，大抵與政府的八部二會平行，分為內政、教育文化、國家安全、憲政法制、科技經濟、財政金融、永續發展、社會安全等八組，各自根據其所司範疇提供政策建議與草擬法案，並司與相關媒體來往、與外國交流等職務。

08年後，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，原先只要與黨部及立院的黨團互動，現在還必須與行政部門互動。我們所作的政策建議呈交給相關單位首長

等參考。但是，究竟我們所提供的政策建議會不會被接受？很難評估。不過我們的政策建議似乎有某些影響力，但是程度所及則很難正確評估。此外，當立法院面臨修法、立法問題，或是當各部會發起某些重要政策議題研究，亦會請我們參加，由我們協助做計畫、提供意見。

不僅如此，基金會還擔負黨與大陸交流的平台，由原國共論壇改名的「兩岸經貿文化論壇」，就是由基金會擔任國台辦海研中心之對口單位，所有籌辦及相關議題的研擬以及共同建議案等，皆由基金會負責幕僚工作。

除了內部不公開的部分研究資料，其他個人研究成果皆以個人名義公佈於基金會網站上；基金會出版品除有每年一期的「台灣展望」及「Taiwan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」，各組分別也有其各自出版品。平時我們作常態性的地方政治生態、地方發展等研究，逢選舉時，尚負責研擬政見與白皮書等，與社會的連結性相當密切。雖然工作繁重，但是產官學三者間的緊密結合，正為基金會的一大優點。

**請問您年輕時的夢想是什麼？可否談談您在比利時的求學經過及日後對您的影響？**

當年在就讀台大政治系時期，我曾想將來的

工作方向。那時我發現自己對國際關係領域相當有興趣，在出國留學之前，我更曾想過是否要當外交官？考量到通熟英語的人太多，我便選擇法語這條路，因緣際會下，畢業前我認識一位比利時神父，透過他的協助，我到了比利時的魯汶大學留學。當時我對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寫下三種可能：當外交官、在國際組織工作或是當教授。而在比利時生活了十年之後，我發現自己並不想長年待在國外，所以選擇回國執教鞭。

回想起來，比利時的求學經驗，對我的世界觀有很大的影響，最大的收穫除了法文進步，也深入瞭解比利時人的生活。因為第一年，我去法比邊界一所中學改善法文，當時學校安排我們每兩週前往當地人家中home stay，使我認識了不同層次的比利時家庭的生活狀態。1964年，我回到魯汶大學正式修業，當時學校的規定相當嚴格，雖然我主修國際關係，但學程中除了三門與本科相關的課程：戰爭法、亞洲國際關係史、及國際勞工組織外，其他補修大學部課程皆是些基礎學科如：道德哲學、社會哲學、政治理論、教會的社會思想、歷史批判及社會學概論等課程，另外，在碩士班則修習政治理論如政治思想史（2年）、政治社會學、比較政府（2年）、開發中國家政治制度理論、經濟學等課程，這些紮實的基礎課程為我的學術之路打了很穩固的基礎。

求學第二年，因拿到魯汶大學的獎學金，使我進一步對比利時的社會福利制度印象深刻且感到欣羨。由於比國的獎學金制度會根據每年的物價指數調漲，且溯及既往，若是結婚還會給予配偶的生活補助費、育兒及房屋津貼。所有補助都是為了讓學生無後顧之憂專心於學業上。

除了鑽研學業，我也開始對比利時人的宗

教、文化、社會都有很多深刻的瞭解與認識。我對於宗教的興趣始於比利時的報紙，當時報上皆設有宗教欄，專門探討宗教相關議題，閱讀專欄開啟了我的濃厚興趣。此外，我的閱讀範疇亦廣泛涉獵文化與文學等，當時我甚至幫沒有社會學基礎的台灣來的同學們講讀法國文學批判，同時也增廣了我對此領域的見識。至今，我還時常告誡學生們，不要將自己侷限在主修的範疇之中，培養廣泛的興趣與拓寬閱讀涉獵範疇，除了增廣見聞，更能活出充實的人生。

### **您曾在學術界，也曾在政府機構擔任過重要職務。在學術與政治之間，請問您內心的選擇是什麼？**

28歲那年當我尚留學比國時，我對於自己未來的生涯規劃有了重要的抉擇，那就是與其走在眾人前頭領導，不如退居幕後作一個幕僚人物。除了因為自己本身個性率直，若作為檯面上人物，對於待人處事及外在表現得拿捏必須注意其微妙之處，更因為從事教職與我的志趣比較相符，回台之後自我調整，嘗試作為意見的提供者而非掌控者，也就是說，與其做決策，我比較喜歡影響決策。

多年的教職與研究使我在學術界建立了地位之後，便開始常被政府徵詢意見、提出政策的建議，緊接著又成為政府智囊團的成員，再成為政府的官員。我心裡的第一優先一直是「何者才是對國家社會有利的做法？」，換言之，理想與現實之間必須務實漸進的去推動，而非一下子就要能實現理想。這個便是我自己對於生涯轉變的內心選擇，也就是「自己如何怎麼推動理想性的實現」了。

## 請問您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歐洲？我們如何與歐洲國家交往？

以前我曾經打趣的說：「從台北到華盛頓最近的距離，應該是台北經過巴黎再到華盛頓。」因為，直接的影響很難達到，但若能透過歐洲去影響美國，也就是加強與歐洲的關係，以達到影響力的發揮，將會更有力量。

當我開始學術生涯時，就已致力推動與歐洲學術界的關係，當時，我每年都會前往歐洲一兩趟，與當地學術界來往，亦邀請歐洲學者到台灣開會，以增加友台的歐洲人士。歐洲是足以影響美國對台的關係的重大力量，當時的歐洲雖尚不能視為一體，卻已是集體代表的象徵，那時的台灣親美友日，對歐洲較為忽略，即便到現在仍沒有太大改變，因我們對美國的倚賴比對歐洲強烈，自然傾向與美國交往。當時歐洲亦礙於中國因素，對我較為疏遠。近年來，我們與歐洲的來往拉近了台歐間的距離。

原則上，若能增加歐洲國家對我們的支持，對我們就更有利，於是，該如何增加與這些國家的交往便是一個重要的問題。我認為智庫與學校都有責任，除了透過學術的來往多結交朋友，亦應與歐洲政界人物結交，許多過去與我們友好的學者在多年之後都擔任政府要職，過去經營的關係便可發揮很大的幫助。此外，除一般會議、參訪行程外，亦可盡力邀請一些較有影響力的人士來台並與當地的智庫、研究中心、行政單位及民間團體來往。我認為，在各方面多方交往、廣結善緣對我們都有好處。

## 可否談談您的人生觀？

第一：人生在世，有多少能力可以貢獻，就貢獻多少力量，且盡量往好的一面去想，不要悲觀。我們社會有很多積極面的事情可以做，不要抱著懷才不遇的心態，現代比起過去增加了更多社會角色可以去貢獻，想想外面有寬闊的空間，更能自由發揮。

第二，不要太計較。如果可以多看積極面與光明面，就可以活得更快樂。

第三，多多幫助他人。也就是說，在各個崗位盡力對他人提供協助，這些都可以讓我們過更愉快充實的生活。

除了以上我自己奉為生活圭臬的這三點，我也常常告訴學生，人生有三件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做到，第一要保持身體健康、第二要好好照顧家庭、第三要有兩三位不計較利益關係的好友，可以無所不談。年紀漸長後，又多了一條，那就是要有一些可以吃吃喝喝的朋友，或是可以一起從事休閒活動的朋友，這樣才不會退休之後失去生活重心，終日無所事事，失去生活目標。

